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批判进路探析

——兼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比较

□ 张广利，许丽娜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上海 200237)

[摘要]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蕴藏着丰富的批判思想，他在反思当今社会发展状态的基础上，敏锐的发现了风险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结构特征，进而对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即科技理性的权威地位、科技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分离、以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批判，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新的审视当今社会发展的视角。同时本文试图通过将其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进行比较，进而理解风险社会理论对于社会理论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 现代性；风险；风险社会；批判；法兰克福学派

[DOI 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1.026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5)01-0131-08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建立在启蒙理性之上的现代性常常和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它常常指与科技进步、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的社会转型，因此，面对急剧的社会转型，有的思想家持悲观态度，有的思想家则持乐观态度，而各种形式的批判理论也加入到针对现代性问题的争论之中。马克思尽管持有人类社会最终获得完全解放的乐观态度，但他深刻的批判了资本主义这一导致严重“异化”现象的压迫性社会体制；韦伯则批判了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吞噬，他关于法理体制的“铁笼”断言充分表明了他对现代性的悲观诊断；而作为社会批判理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针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内在矛盾、人性的异化等作出了激烈的批判。深受德国浪漫主义、历史主义、批判思想传统影响，贝克也毫无例外地以现代性为起点展开了对西方社会现状的批判。那贝克是如何展开批判的？他的批判路径和内容与以往的批判有何不同？笔者想就此作一探讨，以阐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社会理论发展的意义。

1 发展与风险共存：现代性的诊断

如上所述，在社会学研究中，现代性与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经常指与科技进步，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的社会转型，因此，要理解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批判思想，首先必须清楚他眼中的现代性发展逻辑是怎样的，当今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呈现什么特点。在贝克看来，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正在形成之中”。^[1]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被人类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理性的指导下，肇始于西欧的现代化运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们对这样的理性主义发展观和工业社会充满了乐观和信心，但同时人们也越来越频繁的陷入一系列灾变之中，战争，生态危机，化学污染，转基因危机等等让人们出入难以界定的不安全感之中，发展与风险如影随形，甚至风险越来越取代发展而占据主导地位，启蒙理性所预见的美好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ASH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WE1211006)；上海市重点学科社会学建设项目资助(B501)。

作者简介：张广利(1963-)，男，山东淄博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丽娜(1987-)，女，山东临沂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

会似乎还没有到来就已经在弃人们而去。面对此种情形,他认为现代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相互作用使现代化的发展呈现断裂状态,因而现代性的发展再也不是人们所认为的线性的发展了。

具体而言,这些变化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根据领土疆域划定的民族国家社会一直被看做现代社会的行动基础,如今这一基础被撼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无论是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各个国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联系日益紧密,且各种跨国组织日益成为行动主体,人们关于社会是一个个“集装箱”的想法似乎需要改变。在一个交往网络下的世界中,地域已不再构成人们交往的一个障碍。第二,个体化进程与分化进程加快,个体对集体性范畴的依赖变得日益脆弱,人们加入劳动市场,行使各种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不再以组织或家庭为取向,而是以个人为取向。特别是由于教育的普及,妇女对自己的权利和要求不断扩张并最终使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可以说性关系的革命从根本上加速了个体化进程。但这种个体化并不是指个体不受任何束缚,而是一种制度主义的个体化,个体确实从传统的角色支撑关系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个体进入到了一张制度的大网之中,人们更依赖于教育体系,市场,各种社会政策等等。第三,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一直将社会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明确对立之上,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无尽获取来发展工业化,自然完全被人化并被纳入到工业化进程之中。但如今这种对立出现了问题,由于科技的进步,对自然的破坏加剧,生态危机出现,各种环境风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市场等其他风险日益威胁着人们的生活。第四,工业社会在根本上是一个劳动社会或者说是充分就业社会,社会成员通过参与到财富的生产之中来满足自身基本需求。并且工业的活力还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再生产,从而成为人们获得社会保障的基础,也成为人们参与民主的前提。但如今,随着科学信息技术和世界劳动市场的结合,劳动社会这一状态正在被改变,劳动越来越具有弹性化、灵活化和竞争化,失业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现象。第五,在这几个变化中,科学技术都起着核心作用,同样,当面对这些变化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各种副作用如各种类型的风险时,现代化国家依然依靠科学,致力于建立通过不断的功能分化来消除副作用的一个有着鲜明的控制逻辑的大系统。自工业社会开始至今,人类社会这一结构严谨的系统越来越庞大,但它面对的问题和风险也越来越多。^[2]

可以说,依据这些变化发生前后不同的状况,贝克将现代化进程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和第二次现代化进程,或者简单现代化和自反性现代化(在不同的文章中他使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据笔者理解,两组术语意思大体可等同)。但贝克同时也表示,这种划分方法并不代表第一次现代化持续到具体某个年代,之后就有着第二次现代化,两者在有上述区分的同时,也存在着延续性,比如,人权,民主,和平等等。同时,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甚至感受到,从简单现代化到自反性现代化的过渡过程是在未经任何计划下悄无声息的进行着,它是人类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意外后果,人们在享受工业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在削弱并改变着简单现代化,正如“简单现代化归根到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而“自反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3]如此,工业社会被抽离,并重新嵌合之后,便是贝克所认为的风险社会的到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社会学观点认为,新的社会时代的来临必然伴随着社会剧烈的痛苦的分崩离析,例如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冲突论学派就认为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通过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冲突推动着新社会的到来,功能主义也认为社会变迁来源于各个系统之间的失衡,而绕开政治,以无意识的方式导致新社会时代的诞生,这是不可能的。但贝克显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在贝克看来,正是诸如科技对日常生活的改变,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劳动时间和地点的弹性化,个人和家庭生活秩序的改变等微小层面变化的悄无声息的累积,致使简单现代化开始被自反性现代化而代替,但正因为这些变化的微小不易被察觉,贝克认为“我们是在第一次现代化的规范性范畴中作思考,却在第二次现代化的模糊领域与纷杂喧嚣中生活和行动”,^[4]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对风险社会展开了批判,意在打破传统社会科学的范畴和各种预设,警醒人们认识到社会所发生的变化。

2 风险何以可能:风险社会的运作

具体说来,贝克沿着以下两条路径对风险社会的运作做了分析,深刻揭露了最终导致西方现代社会一步步陷入风险社会的相关因素,严厉批判了导致如今风险状况的科技,制度等方面。

2.1 对科技权威地位的批判。贝克认为,无可否

认,在科技理性的指导下,现代工业经济得以腾飞,现代社会复杂高效的科层体制日益完善,人类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从个体生活到国家活动无不以科技理性为基础,同时加之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范围的各种活动高度相关,各行为主体相互影响。科技的发展为人类改造自然,造福人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它给予了人类丰厚的物质生活,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虽然,作为民族国家的工业社会在取得所谓的进步同时,许多风险和威胁也被系统化的产出,但此时基于下面两个方面原因,关于这些风险的定义被一再的否认。一方面,在简单现代化阶段,财富生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发展过程中所产出的风险被进步乐观主义所忽视和否认。另一方面,科学垄断了对风险的定义过程,首先对风险存在和分配的论证完全要依赖于科技知识,不仅需要关于风险事实的陈述,还需要在科学上建立一种因果关系,而因科学的过度分工以及对外在实践的较少关注,当面对复杂的因果关系确定之时,科学往往束手无策,直到风险变成事实。另外新风险具有不可见性,延缓性,比如一些风险的副作用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是潜移默化的,不是人眼睛可以直接看到和感受的,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些因素都导致关于风险的定义一再被压制和否认。^[5]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出现了一种制度化的精神分裂证,“在公众的感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旧是进步的观念,工业生产,保障就业岗位以及财富生产,而其他的一切都遭到否认,”正是这样的技术乐观主义的盛行和对风险的刻意否认导致风险慢慢积累,不断增长。^[6]另外,鉴于人们对科技理性的推崇,人们相信科学可以征服自然、可以克服无知和不确定性,人类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秩序,因此,在如此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人们不遗余力的推进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同时加之当今科技所具有的高度创新性、其功用的潜在性,以及其传播和使用范围的广泛性,使其所带来的风险大大超过传统的自然风险,并且受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人们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各种新危险事物的威胁,陷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失控的世界”。

2.2 对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分离的批判。在对科学权威地位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贝克进一步批判了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分离。在工业社会物质短缺的境况下,现代化的进程以科技理性作为钥匙开启了物质财富的大门。在利益的驱动下,工业的发展需要科

技的支撑,而科技活动开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也需从工业中获得,因而科技成为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的直接动力,同时科技和生产力互为对方提供合法性前提。可以说,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来源于科学、政治、产业三者的相互联合以及它们内部的不断博弈。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公众的利益。并且,科学活动、工商业活动都是高度自主、独立的领域,不受公众影响,相比于以公众为代表的社会理性,科学理性不仅力量强大而且从传统上就具有合法性。因而无辜的人们对政治领域、科技领域等高层领域总是不知情,他们总是被动的跟在发展的后面,在政府,企业,跨国组织的引领下一步步走入受市场引导而不断发展的科技的陷阱。对此,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列出了很多实例,比如面对抗议者对工厂烟囱排放物以及农药、杀虫剂等其他化学物品的质疑,专家体系利用其专业知识,设置“可接受水平”并帮助实现“副作用的合法化”,“以‘纯粹’科学的天真,风险研究者保卫着‘证明因果关系的高超技艺’,进而阻碍了人们的抗议,以缺少因果为由将抗议扼杀在萌芽阶段。”^[7]贝克尖锐地指出,“高度工业化文明中风险意识的起源,在自然科学的历史上确实不是光荣的一页,它依靠科学否认的持续掩护而形成,并且仍旧受其压迫。”^[8]因此,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尽管物质财富不断积累,但是之前被隐藏的由于科技的使用而带来的风险日益显现。而这些风险在根本上是由占据社会的知识和权力地位的各种官僚和技术精英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不断进行决策和技术创新以促进所谓的社会进步,而又忽视这些决策和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关于组织和生活的大量不确定性后果而不断积累并爆发的,公众从始至终都是被动参与整个过程,但却需承担所有风险后果。而当公众寻求风险制造责任时,科技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再次出现断裂。两种理性代表者处于不同的利益框架之中,“双方都在绕开对方谈论问题。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都不会得到风险专家的回答,而专家回答的问题也没有切中要害,不能安抚民众的焦虑。”^[9]而理想的情况应该是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一方面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论证和治理需要科学的支撑,另一方面依靠科技的工业发展需要考虑到公众的期望和价值判断,对此,贝克修改了一条著名的谚语,“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10]

贝克对自反性现代化的制度模式进行了批判。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现代性就是一项由民族国

家实施的社会控制和技术控制的项目。^[11]因此,从简单性现代化阶段开始,在启蒙理性的指引下,社会被当作一个结构严谨的大系统,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社会这个大系统根据功能需要进行持续的分化从而实现必要的社会功能。因此,随着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加剧,整个社会变成一张根据不同的专业分工而形成的严密科层体制的大网。这个不断制度化的过程,其初衷是为了应对通向现代化之路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但它却产生了一些未预料到的后果,使它远离其初衷。首要的一个后果就是,当风险出现时候,各个公共机构总是想法设法的去逃避承担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责任。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曾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面对土壤污染问题,责任应该谁来承担呢?是耕种者吗?他们只是为了生存通过大量施肥来促进生产,那应该是研制化肥的科学家吗?他们早就知道有毒化肥对土壤的污染,但为什么不告知政府停止发放销售化肥的许可证或者已告之政府,但政府为什么依然在发放许可证?但是显然政府和科学家并不直接种地,因此,面对此种情形,无论是科学,还是政治都不会主动承担责任。对此,贝克将这样的治理困境称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其基本含义为:“第一次现代化所提出的用以明确责任和分摊费用的一切方法手段,如今在风险全球化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即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负责,而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并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在这种过程中,是根本无法查明谁该负责的”。^[12]对此,贝克从系统的角度做了阐释。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导致劳动分工的高度专业化和精细化,高度专门化的机构在功能上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导致无法从中单独分离出某一个原因和结果。因此,任何人既是原因也是结果,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存在一种总体的共谋。同时,这种高度分化的系统使个人在持续行动时不必考虑对之应付的责任,排除了道德的考虑,只关注物理的重复,从而导致整体责任的缺失。^[13]

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个体化进程的加速。个体化在早期的历史阶段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出现过,但随着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生产不断扩大,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张,以及为满足不断专业化所需要的各种科层组织的建立和分化,与此相对应,教育机制也开始普遍化等等,这些因素都加速了个体化进程。贝克认为在晚期现代性中,个体化是劳动市场的产物,在

劳动市场中,存在着教育,流动和竞争三个维度,教育时间的延长以及受教育的普遍化为个体提供了进入劳动市场发展自己职业的资格,而个体进入市场就必然经历着流动和竞争,这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最终加速了个体化进程。^[14]这里的个体化不等于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新的个体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因为,个体化过程使个体慢慢从传统的性别角色、家庭、阶级以及旧有的工作模式中解放出来,而是更多的与各种外部环境(如教育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等)发生关系,并被嵌入到这些外部结构中,也就是说个体的境况开始依赖于外在的诸如劳动力市场,福利国家的政策等制度控制机构。^[15]一方面个体表面上虽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从传统的社会形式和义务关系中解脱出来,可以自我选择、自我决策,个体创造力得到释放,但同时个体又被嵌入到新的社会结构中,并被要求在自己生命中解决系统矛盾,成为风险承担主体,每个人被束缚在这个制度化结构之中,无人脱离这个结构中风险的影响。例如,工业社会的充分就业是以妇女在家义务劳动为基础的,如今随着妇女接受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与男性竞争劳动岗位,与此同时,男女关系,亲子关系,家庭模式都遭遇到挑战,再加上劳动合同,劳动地点,劳动时间和劳动时间的灵活性加剧了失业,可以说,无论是从风险的数量,还是从风险的类型来看,人们都经历着更多难以预测的风险。而尽管今天制度体系如此完备,当各种外力摧毁了传统的角色分工,阶级纽带,社会保障,并未对个体化做好充分心理准备的个人将不会从结构和制度层面获得些许安慰,各种风险带来的不安全感、焦虑、冲突等危机只能通过面向个体的心理治疗来缓解,却缺乏相应的制度形式来保障个体的健康生存状态。这就是贝克所要批判的当今西方社会制度设置中的制度空白现象,目前的各种保障制度是无法有效帮助个体来抵御个体生活的极端不稳定状态的,当然也并不表明贝克是不支持个体化进程,相反,他认为个体化进程有利于理性的改革和政治的再造。

这样,贝克就从科技和制度两个层面剖析了工业社会如何演变为风险社会(当然这两个层面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叉共同发挥作用的),而正是这个演变过程所采用的潜在的副作用的模式助长了人们对于工业社会的信心,掩盖了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分裂,维护了国家制度模式的合法性,而人们在推进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意外的风险不会自行消失,而是暗中积累并最终破坏简单现代性的根

基,最后风险社会来临,财富分配逻辑被风险分配逻辑所代替。另外,不同类型的风险可以相互传递,例如健康风险可能会导致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风险这一奇特的性质,致使风险社会的所有个体,不论贫穷或富有,不论是受害者或者是肇事者,或早或晚,都会受到风险的影响,并且贝克还认为,现代风险伴随着全球化过程而具有全球性,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使世界上的各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并构成一个世界风险社会。这样,贝克就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完整的风险社会图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社会批判思想家一样,贝克的目标也在于通过立足于社会发展现实的批判分析而建构一种关于社会总体发展的理论,从而指导未来社会的重建和解放。因此,风险社会理论针对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提出了诸如“第二次启蒙”,推行“亚政治”等等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些方案都带有乌托邦性质,但是,它为我们规避风险提供了一个富有启示性的路径。

3 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新”在何处

在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所包含的批判思想作了以上论述之后,笔者想将其与社会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即批判社会学理论做一比较,以明确风险社会理论在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及意义。

批判社会学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批判社会学理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具有批判取向的多种社会学理论,本文中所述的批判理论主要限于狭义上的批判社会学理论,也即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身是于1923年成立的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成立初期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批判思想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压迫性社会制度,他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因此要想推翻资本主义压迫体制,首先就是要改变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因此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实现对工人阶级的异化,这种压迫性社会关系如何作用等方面进行批判,进而通过批判希望唤起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他相信工人阶级具有实践能力,能够通过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统治,进而实现人类的解放。因此,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主要特征就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以及强

烈的行动倾向。他实现人类解放的主张也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调。同时,不得不提的是对法兰克福学派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批判思想就是韦伯的批判思想。韦伯关注的主要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他对这个历史转变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其关键环节即为理性化。他改造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理性”概念,通过对理性类别及其功用的分析,指出了理性化过程所带来的双重作用。一方面理性化使传统社会脱离蒙昧状态进入到一个世俗化、科学化的现代世界,另一方面,工具理性日益扩张并吞噬生活领域,传统道德瓦解,社会关系物化,社会世界将陷于非人格化的法理体制“牢笼”不能自拔。很明显,与马克思通过阶级斗争,人类终将获得解放的乐观态度相比,韦伯的态度比较悲观,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革命的可能,而是会因为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被非人格化的科层制力量永远统治下去。^[16]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最初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却促使他们在保持实现人类社会解放这一批判目标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脱离了马克思的批判思路而转而沿用了韦伯的批判路径也即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实际上是将马克思的批判路径颠倒过来,即主要批判意识形态而非经济结构。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工人阶级运动的失败,一战后期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俄国革命退化为斯大林主义而与此同时,科层制扩张,科技应用对工具理性彰显的推动,特别是在美国,工人似乎更加愿意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种种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并不会崩溃。^[17]这样看来,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悲观评价比马克思实现人类解放的梦想更具有合理性,因此,为了重建马克思有关人类具有创造历史的实践能力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适应时代要求,将早期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转到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希望通过工具理性批判唤起工人阶级的觉醒。例如,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沿着韦伯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认识到“启蒙精神摧毁了旧的不平等的、不正确的东西,以及直接的统治权,但同时又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一些存在的东西与另一些存在的东西的关系中,使这种统治权永恒化。”^[18]“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的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19]马尔库塞则更加直接的指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20]这样,法兰克福学派紧紧围绕着工具理性所导致的这一困境,详尽

的描述了启蒙的辩证过程,并将批判的锋芒扩展到源于工具理性的人类整个文明,对当时社会展开了科技批判,大众文化批判,人格心理批判,美学批判等等,认为工具理性的行为原则被运用到现代社会中的几乎各个领域,社会、文化、个体都受到其严重的侵蚀,“现代化几乎成了文化平面化、低俗化和个体单面化、异己化的同义词。”^[21]这样,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物虽然批判了当时社会工具理性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但是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个体内部意识状态,而不是政治经济力量内部的矛盾,这样的批判只能在观念和概念层面上发挥作用,并且他们从根本上采用了一种主体和客体分化的二元论,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分离开来,分析工具理性如何侵蚀人的主观世界,揭示个体所受到的统治,这样的批判路径注定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同韦伯一样陷入了对理性的深深绝望之中,进而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成立之初所作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并进而发展出实现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梦想的理论体系。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一方面继承了前辈们对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性所进行的批判的传统,批判了科层制国家扩张而导致的对公共领域的压制以及自由的衰落,另一方面增加了对行动者之间的交往过程的批判,以此为核心,建构了交往行动理论,导致韦伯和法兰克福第一代代表人物陷入悲观主义的理性化困境。哈贝马斯受康德“理性兴趣”概念影响,他假定了三种囊括人类所有理性领域的基本知识类型,即经验分析型知识,历史解释型知识,批判型知识,这三种知识分别反映了人类的三种基本旨趣,即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这些旨趣并不存在于个体之中,而是存在于对再生产、意义和自由的普遍要求中,而当这些再生产、意义和自由被组织起来而形成社会时候,它们就被分类了。^[22]实际上,在哈贝马斯那里,这三种旨趣就对应着三种理性结构也即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和批判理性,这也意味着哈贝马斯修正了韦伯的狭隘的合理性的概念。同时,哈贝马斯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行为分为两种类型即劳动和交往(相互作用),工具理性存在于劳动之中,而交往理性和批判理性则存在于交往之中,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确实是工具理性几乎控制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同时也代表着通过劳动和发展科学的技术旨趣已经支配着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了,也即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和批判理性的侵蚀,因

此,很明显,要挣脱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束缚,不是单纯的陷入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的单一路径,还要通过发展另外两种理性来加以制衡,也就是重建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动的理性,如若没有关于人们如何互动和交往的知识,实现人类解放是不可能的。于是,哈贝马斯通过提出普通语用学,建构了沟通行动理论,既避免了陷入上一代批判人物的主观主义泥潭,实现了从主体哲学到主体间哲学的转变,也走出了现代化两难困境的悲观主义阴影,但哈贝马斯使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从对工具理性,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向对语言批判,这不仅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锋芒弱化,而且使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越来越疏离。

以上就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历程的一个简单回顾,通过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批判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首先,在形式上,两种理论都是宏观的,它们都致力于判断、理解、预测和改变社会的总体结构,尽管二者实现这一目标的程度不同,但两者都是针对各自面对的社会整体,贝克关注的是他所定义的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转变,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关注工具理性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他们的理论都带有总体性的历史主义的色彩。其次,二者都强调否定性逻辑,通过批判而展开不断否定的过程,以期望唤起公众采取实际行动改变现状。法兰克福学派首先论证了启蒙的辩证过程,然后将批判的锋芒扩展到受工具理性控制的人类整个文明,对当时社会展开了科技批判,大众文化批判,人格心理批判,美学批判等等,最后由哈贝马斯找到了走出现代化困境的出路,即他的沟通行为理论,期望通过将目的行为转向交往行为来达成共识,实现社会整合。不过,他的这个解决方案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贝克同样批判了工具理性对现代社会的控制,但他并未止步于此,他还沿着工具理性,进一步展开了对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分裂的批判,认为西方工业社会已演变风险社会,而他提供的出路就是通过启蒙,进而推行亚政治。相比来说,贝克的方案更具有可行性,他将问题解决的方法和政治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因为风险影响着每一个人,因此风险能起到很好的政治动员能力。总的来说,两种理论都不满足于单纯的事实描述,而是以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意识进行社会研究,在批判审视社会现象“是什么”、“为什么”的基础上,也力图提供社会应该怎样发展的设计,从而重建未来社会,从而体现了它们试图将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的意愿。再次,两种理论都带有预测

性质,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诊断都带有一种预言色彩,特别是关于重建社会的论证只能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求证其理论的正确与否。我们不能确定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特别是世界风险社会已经到来,也不能测定他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的效用。同样,我们也不能确定人类社会是否已经完全陷入现代化的两难困境,而交往行动理论是否真的能帮助我们走出这个困境,这些都需要历史的检验。以上就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相同之处,也正是在以上层面上,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搭上了批判理论的脉搏。

不过,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还具有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所没有的特点,这些新特点不仅使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具备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资格,而且还撼动了现有的社会理论体系,对传统社会理论发起了挑战。

首先,贝克创新了对现代性的认识。长久以来,对现代性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部分社会学家们受启蒙运动的鼓舞一般将科学视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社会世界也将呈现从一个发展阶段到另一个发展阶段的不断进步的单线进化特征。另一种就是这些思想家们对科学持怀疑态度,认为科学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引发问题的源泉。因此,他们对现代性的发展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不过他们也没有否定现代性的单线发展路径,只是更加关注到了由现代性发展而引发的对人的异化等问题。而贝克选择了第三条路,他认为现代性的发展并非是一种单线进化,而是出现了断裂,分化成两种不同的现代性即简单现代性和自反现代性,它们分别对应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而自反现代化将有可能毁灭整个简单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显然,贝克认可工业社会的文明成果,但他关注的焦点不在这些源于工具理性文明成果上,也不在工具理性对人的精神的束缚,而在于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只影响人的精神,更有可能威胁人的生存,因此,贝克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当代诸如战争,生态危机,化学污染,转基因危机等问题的视角,促使人们更紧迫的反思当代社会的发展模式。

其次,贝克将风险一词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一种扰动。“风险的本质并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会发生。”^[2]风险不只产生于科学技术应用过程,而且还产生于不同文化不同利益背景之下的人们共同将之赋予意义的过

程。而对风险的感知和赋予意义的过程不能脱离客观依据而随意建构。于是,风险这个概念使实在论和建构论同时失效,因为风险不存在于可以通过经验直接感受和把握的实在世界,也不存在于纯粹的建构世界。同时,随着全球化,科技化的发展,风险的传播特性使它超越了性别,阶级,民族和国界,所有个体,不论贫穷或富有,不论是受害者或者是肇事者,或早或晚,都会受到风险的影响,这样,性别,阶级,民族和国界等概念作为进行社会研究基本单位的效度被大大降低。

再次,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预设了对客观知识和二元论的批判。一直以来,人们将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视为是客观独立,但贝克对此并不认同。他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对科学理性的批判就证明了科学的意向性。在利益的驱动下,工业的发展需要科技的支撑,而科技活动开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也需从工业中获得,因而科技成为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的直接动力,同时科技和生产力互为对方提供合法性前提,因此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首先在于生产力,它本身并不是以一种独立的姿态而是带着某种意向性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同时,贝克通过对理性的思考,改变了一种人们惯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就在现代性发展中占据着权威的地位,理性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最终需求的这一特性使人们学会了用二元对立的逻辑思考,例如自然与社会、对与错、白与黑等等。在贝克看来正是这种不受约束,过于追求某一终极目标的思维方式在给人们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使人们遭受着各种后果,当前人们面临的各种风险比如环境污染,战争等等即是这种理性发展的后果。因此,在贝克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破除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例如,他提倡打破各学科之间的严格界线共同研究风险问题;倡导亚政治,打破政治与非政治的二元对立;反对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治理模,提倡世界主义的构想等等。

4 小结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蕴藏着丰富的批判思想,它对当今社会的高科技的发展,各种社会制度的不断扩张都进行了敏锐的批判,并提出了一套走出风险社会的方案。更重要的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给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社会学的想象力。自1970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提出主流社会学遭遇挑战而出现社会学的

危机以来,众多社会学家都在试图超越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等传统,而寻求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式。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一些新观念、新流派不断涌现,但是社会学家实际上仍然困囿在“社会”、“个体”、“结构”、“文化”、“民族国家”等传统的术语当中。鲍曼曾言,现代文明遭遇的困境就是它不再质疑本身。^[24]而贝克则敏锐的发现了现代社会发展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他将“风险”这个概念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认为风险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结构特征,从而引发了众多学者关于风险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并且“风险”概念本身的实在性和建构性的双重本质,风险传递的全球性等特征,促使社会学家重新思考社会学理论“个人”与“集体”、“民族国家”与“世界”、“主观”与“客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和思维方式,这些都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5][7][8][9][10][13][14]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3, 26, 74, 83, 30, 34, 114-116
- [2][4][6][12] 乌尔里希·贝克, 约翰内斯·维尔姆斯. 自由与资本主义[M]. 路国林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20-21, 25, 160, 143,

- [3] 乌尔里希·贝克, 安东尼·吉登斯, 斯科特·拉什. 自反性现代化[M]. 赵文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5.
- [11][23] 约斯特·房·龙编著.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 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M]. 赵延东等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215, 3.
- [15] 乌尔里希·贝克, 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海姆. 个体化 [M]. 李荣山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36.
- [16][17][22] 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第六版, 下 [M]. 邱泽奇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228, 229-234, 243.
- [18]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洪佩郁, 蔺月峰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10.
- [19]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翻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1.
- [20] 马尔库塞. 工业社会与新左派[M]. 任立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82.
- [21] 傅永军. 现代性与社会批判理论[J]. 文史哲, 2000, (5).
- [24] Bauman. Globalization [M].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1998.5.

责任编辑 梅瑞祥

(上接第 121 页)

参考文献:

- [1] 地方政府在校企紧密合作中的作用[EB/OL]. 新华网浙江频道, 2006-06-20.
- [2] 吴红宇, 杨群祥. 影响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因素研究——基于 910 份调查问卷的分析[J]. 职业技术教育, 2012, (16).
- [3] 赵静, 黄云忠. 关于校企合作模式与机制的研究[J]. 改革, 2012, (06).
- [4] 吕昕.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J].

-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 (09).
- [5] 黄快林. 我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03).
- [6] 赖玮. 从“三鹿事件”看企业社会责任[J]. 科技广场, 2008, (09).
- [7] 薛燕. 切实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感[J]. 集团经济. 管理创新, 2012, (06).

责任编辑 梅瑞祥